

潜伏

——抗战时期军统的秘密行动

国民党特工在沦陷区真实的潜伏故事

国内首部反映国民党特工在隐蔽战线上与众多
汉奸展开的殊死搏斗

团结出版社



珍珠 戰

——抗战时期军统的秘密行动

方明◎著

团结出版社

前 言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这个特务机构为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能耳熟能详。在几十年的民国史上，没有什么能比军统这个名称更让人感到恐惧和厌恶的了。

军统的前身是“中华复兴社”。1932年，“一·二九”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抗日必先剿共，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加强特务组织，仿效德国希特勒的特务统治，组建“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任“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少将处长，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阴险狡诈的戴笠深知蒋介石利用“中华复兴社”铲除异己的意图。因此，这个特务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围绕着两个目标开展工作。

一是“彻底消灭共产党”。为达此目的，这个特务组织配合蒋介石的“剿共”军事行动。一面在前方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大搞破坏。设立封锁线阻止进步青年和学生进入解放区，胁迫他们加入军统。以重用等各种诱饵策反中共党员。1938年春，张国焘在军统的利诱下由延安叛逃。另一面在后方各地逮捕和杀害中共地下党员，以恐怖手段维护国管区的统治。宣侠父等众多共产党员直接或间接地死于军统的暗杀和迫害之中。

二是对付反对和不满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一切异己力量。为达此目的，这个特务组织大搞暗杀活动。暗杀左派进步人士，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杨铨，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上海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等；暗杀异己分子，如四川军阀刘湘，湖南督军张敬尧，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西北军统帅杨虎城及其旧部杜斌丞等。

在这些特务活动中，戴笠除了充当蒋介石的刽子手外，对于反蒋的政治运动，他也想方设法进行破坏。对于蒋介石看不顺眼的人，他千方百计地打击和陷害，因此博取了蒋介石的欢心，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后因日本的进逼，迫于压力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合作而共同抗日，下令停止了“中华复兴社”的活动，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在戴笠的领导

下这个换汤不换药的特务组织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公开招牌。

虽然军统做了不少恶事，然而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维护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利益，军统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暂时对准了日本和叛变蒋介石的汪伪集团的众多汉奸。于是，倚仗他的诸多优势，完成了许多他人难以替代的艰难使命。如在各大敌占区的城市部署高效率的间谍网络、在抗战前期侦破黄浚泄露重大机密的间谍案、在敌占区的各大城市展开“游击战”、在北平暗杀日本天皇的特使；追杀汪精卫、与日本的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电文……特别是对罪大恶极的诸多汉奸展开大规模的暗杀行动等。

军统与众多汉奸的关系极其复杂和微妙。汪伪集团的许多出名的汉奸都是由军统培养的特务叛变组成。例如汪伪政府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就曾是军统第三处处长。再如戴笠的得力干将、军统上海站站长、被称为军统“四大金刚”的王天木被汪伪特务逮捕后投降汪伪。接替他的军统组织沪一区的区长，曾经的“四大金刚”之一、戴笠的又一得力干将陈恭澍，随后也被汪伪特务机关逮捕后带领着全区军统人员叛变投汪，致使军统元气大伤，戴笠颜面尽损，恼羞成怒。因此，抗战时期军统对汉奸的斗争既是维护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利益，同时又有着肃清军统叛徒的私仇。军统与汪伪汉奸有时相互血腥暗杀，有时又出于自身利益而相互策反、相互利用和勾结。而对汪伪汉奸的这些暗杀和策反的运作中，夹杂了大量军统自身的利益。相互倾轧、利用锄奸剪除异己的事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接收大员的军统各省市站长，乘机中饱私囊、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的闹剧时有发生。

在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中，笔者力图用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展示这些曾被淡化和忽略的史实。这些抗战时期军统所做的锄奸行动的史实展现，不是美化军统，也不是为这个残害过大量进步人士的冷血组织正名，而是更为全面地展现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军统这个邪恶凶残的组织也不得不为自身利益而投入到这场艰苦决绝的斗争中去，客观上为抗战出过一份力，从而使人们更全面和客观地看待这一邪恶组织的复杂性。

委员长身边的炸弹	53
被破获的间谍网	54
父子间谍的覆灭	55
美女间谍之死	57
2. 李士群之死	58
“女诸葛”川岛芳子	58
双料叛徒	60
投靠杜月笙	61
狗咬狗	64
两面不讨好	65
百密一疏	69
死于主子之手的奴才	70
3. “假精灵”丁默邨	73
卖身的上、中、下策	73
邪恶的“七十六号”	76
俗套路的美人计	80
柔弱的凛然女杰	86
给自己判的死刑	88
4. 叛逃的王天木	89
“四大金刚”之一被逼反	89
铁杆汉奸	92
灾难性后果	95
5. 让戴笠痛恨的陈恭澍	96
初入“东厂”	96
多米诺效应	99
军统上海站再次覆灭	102
被叛徒耍弄的叛徒	104
6. 刘戈青事件	107
义侠刘戈青	107
军统楷模	109
第四章 追杀大汉奸	115
1. 刺杀汪精卫前后	115
汉奸“老大”出走	115

“十八罗汉”下河内	118
霸王硬上弓	125
油盐不进的汪精卫	128
清“君”侧行动	131
灵验的箴言	132
着了道的汉奸太太	135
2. 巨奸周佛海与军统的微妙关系	138
从中共元老到大汉奸	138
翻云覆雨的政客	144
大恶不归路	150
3. 伪“外交部部长”夜入鬼门关	164
刘戈青受命	164
自比苏秦的国贼	167
过不去年的汉奸	168
4. 张敬尧血溅六国饭店	170
巧施暗杀方案	170
策划于密室	172
裁缝带来的转机	175
5. 大佬张啸林殒命	178
混混出身的“教父”	178
暗箭难防	179
神枪手保镖	184
被戴老板盯上	186
6. 死在厨师手上的伪上海市市长	188
从大买办到大汉奸	188
色厉内荏的奴才	191
被汉奸救了的厨子	192
粉红的圈套	194
厨师杀手	195
大汉奸魂断板斧	197
7. 难以尽述的军统女特工	200
“七姊妹花”	200
巾帼英雄	201

第五章	胜利后的锄奸和“收奸”	204
1.	“劫收”闹剧	204
	捷足先登	204
	总攻出发地	208
	先下手为强	209
	伪军将领变脸	214
2.	周镐事件	217
3.	上海肃奸	220
	运筹帷幄	220
	衣锦还乡	221
	接收大员中的“劫受”大员	223
	迷离鸿门宴	224
	诱捕汉奸	226
	对背叛者也有亲疏	228
	大逆之死	230
4.	平津肃奸	232
后 记		237

第一章 委员长的佩剑

1. 从“十三太保”到特工王国

抗日战争期间，曾有盟国的新闻媒体称，由戴笠统领的军统组织是蒋介石腰间一柄锋利的佩剑。也有人说，这柄佩剑就是戴笠本人。

那么，这柄佩剑是如何被锻造，又是怎样被打磨的如此锋利的呢？

我们不妨来简单审视一下军统的发展轨迹。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

早在1927年7月，第一次北伐结束不久，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使蒋介石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有鉴于此，蒋决心加强军事上的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内成立了一个密查组，由戴笠等10人组成。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调查异己分子。但蒋介石下野后，密查组就解散了。

1932年初，蒋介石又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则称力行社。十三位骨干后来被称为“十三太保”。该组织3月初正式成立。由蒋介石兼社长，下设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而这些干事中多为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唯有戴笠是黄埔六期的，算是学弟。



戴笠最大的靠山——蒋介石

该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蒋介石最重视的就是特务处，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蒋介石的初衷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6个人选，如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戴笠虽也位列其中，但因资历较浅，

不被看好。

但后来蒋介石仍把自己最看重的特务处交给了戴笠。

1932年4月1日，在南京近郊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授命戴笠组建特务处。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类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

特务处成立时，设有书记室，由唐纵任书记（以后称书记长），下设四个科，先后由张炎元、徐亮、梁干乔、杨继荣、徐业道等任科长。该处成立时，已由当年密查组时的10多个人发展成为100多人，以后逐渐发展到近1000人。

由于复兴社的特务处是一个秘密组织，不能公开捕人、杀人，行事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1932年9月，蒋介石又派戴笠兼任由CC集团头子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使之便于公开搞特务活动。

这个最初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小军统局”，是一个大杂烩。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是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也是利用军委会的招牌来作掩护的，不同于戴笠后来主持的大军统局。1934年7月，蒋介石免去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邓文仪职务后，命令戴笠兼任该科科长，将该科内外勤特务并入戴笠的特务处。

特务处的核心组织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不多的经费在南京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里当做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特务处已经变成了实质的军统组织。其指挥大权也被掌握在了戴笠手中。军统的总指挥部设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这支准军事性质的秘密特工部队所配备的也都是美式装备。

戴笠刚接手军统局时，特务处时期的副处长郑介民被安排为该局的主任秘书，相当于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升格成了处。

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军统局的组织越来越大。1942年时的机构职能为：第一处专管军事情报，第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仍为行动处，第四处还是电讯处，第五处则是由司法科扩充的司法处，第六处是人事室改成的，会计

室则改为第七处，总务科扩充为第八处。训练科改成了训练处，行动处的稽警科也变成了警务处，几个专门负责布置沦陷地区工作的单位，则合并成为布置处。

此外还有设计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策反委员会等组织。抗战胜利时又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

与各处平级的组织还有：由中共叛徒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研究杀人放火与破坏及制造毒药等的特种技术研究室、由经济情报科扩充的经济研究室。还有主管文娱活动的中山室。另外，译电科也升格成了机要组，文书科成了文书组，武装特务队也由大队变成总队，后又改成特务团，汽车队也成了汽车大队。

军统机构中还有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 40 多个，从事内勤工作的特工有 1400 多人，大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而在抗日战争中，不包括外围组织的人员，军统局机构的内外勤在编工作人员就超过了 10 万人！成了一个国民政府中机构最为庞大的，也是绝对无法替代的独立的特殊机构。

至此，军统已经被经营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工王国。

1946 年 3 月 17 日，戴从青岛乘专机赴沪转渝，飞机失事，摔死在南京附近板桥镇岱山。戴笠死后，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组织，决定缩编裁员。

这年夏天，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军统局也随之改为国防部保密局。1946 年 7 月 1 日，国防部的各厅局成立，但直到同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

军统局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畸形的怪胎。它和与它近似的特工机构，如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英国的军情五处、前苏联的肃反委员会（即后来的克格勃）等都有很大的区别。

如纳粹德国时期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有“预防性逮捕权”。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抵抗战士及犹太人等，都未经法律程序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但它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对付被占领区的反抗组织上。

而前苏联的肃反委员会是针对十月革命胜利后，彼得格勒、莫斯科及

与其毗邻地区的混乱状态而组建的。由老革命家、铁腕人物捷尔任斯基任主席。“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成立后，以“红色恐怖”的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当时人们称捷尔任斯基为“资产阶级的灾星”。这个组织主要是对付外国的颠覆势力以及国内的叛徒。

再如英国的军情五处和以色列的“摩萨德”，这些秘密警察机构则主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国外。

以上这些在近现代史上非常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人群产生了恐慌，它们虽然和军统一样都是秘密组织，但性质和行为方法却大相径庭。

军统既受制于相应的国家机关，有着自己特殊的任务，又在一定的范围和领域内有权力独断专行；它和“盖世太保”与“肃反委员会”一样，有着严格的组织条例和严酷的内部纪律，却又掺杂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江湖侠气。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被注入了家族的因素，而不像类似的外国机构那样，仅仅是刻板的同事。

所有这些，和它的组织领导者戴笠的出身、经历、个人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



军统的大管家——戴笠

2. 特工“皇帝”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代中国人的眼里，戴笠就是罪恶和魔鬼的化身。历史学者和文艺家们，早已将他勾画成了一个集万恶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

被文艺家们称之为“中国的希姆莱”（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头目）的戴笠臭名昭著。他任国民党军统局长八年，曾密令残杀了许多爱国人士，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然而，告别极“左”时代后，经过三十余年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反思，我们又对戴笠有了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戴笠 1897 年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被人敬畏但却并不讨同伴喜欢的人，不过他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1909 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 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

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的主席。但他的为人属于“两头冒尖”的类型。虽然有进步思想，但青少年时期的作为也是劣迹斑斑，不时可以见到他盗窃、赌博、斗殴的记录。

戴笠在1914年结婚，新娘毛秀丛的父亲毛应升是江山县枫林镇上的地主。1916年戴笠因偷窃被校方开除。次年他的儿子藏宜出生。后来戴笠因在赌博中屡次作弊被抓，为了保命，戴笠凑了一些路费跑到了杭州，在那里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并结交了一些地痞，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当这些为军队纪律所不容的行为受到惩罚时，他便当了逃兵。

1921年，戴笠利用他和青帮的关



上海滩风云人物——黄金荣

系离开杭州去了上海，在这个他尚不熟悉的大都市，他的帮会背景又一次帮了他。他在杭州的“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当时上海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

于是通过这些关系，又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上海的“春秋战国”时代，戴笠成了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朋友。

1923年，戴笠经常光顾上海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地痞流氓中间已经小有名气。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看出，年纪轻轻的戴笠是个



年轻时期的杜月笙

“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介石这位特工首脑的关系，杜月笙的机要秘书万墨林（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组织）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

万在1928年的一份报告中说，当时戴笠正在为胡靖安做情报搜集工作。他意识到，如果自己要想在将来有所作为，就必须和上海的“地下社会”建立同盟关系。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结识一个重要朋友。”这位朋友，指的就是杜月笙。后来他和杨虎、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

戴笠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倾一方的“特工皇帝”，仅仅依靠和这些江湖朋友结交“铁哥们儿”当然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政权机关里铁腕人物的支持。

当一个矮个子青年胡宗南来杭州时，戴笠偶然结识了他。戴笠当时一定没有想到，在后来的年代里，胡宗南竟然能够成为蒋介石黄埔系将领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当然此人也成了戴笠在黄埔将领中最为重要的同盟者。以至于两人在以后的岁月中成了关系最密切的朋友，戴笠甚至把自己仍爱着的军统女特工叶霞娣送给胡宗南做了老婆。而后者是曾经发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终身不娶的。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

会面的具体时间不太清楚，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集资。戴笠则只是被这些革命派当做“马仔”，但蒋介石的盟友戴季陶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跟他同姓的小兄弟身上，有些他们所能利用的特殊气质和能力。因此他对戴笠的态度也好起来。精明的戴笠当时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干什么，但猜想他们是孙中山的人，正在上海从事当局所不容的工作。



戴笠与蒋介石

蒋介石发现戴季陶身边的戴笠为人精明，于是也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看。并把一些较重要的任务交给戴笠去完成。由此，戴笠进入了蒋介石的工作圈子。

戴笠其人生就精明，他似乎在当时就能意识到这帮人将来会有大的作为，于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这一注赌博戴笠赢的钵满盆满，使他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成了蒋介石最忠诚的鹰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无限的权力。

再往后的事情，读者已经从诸多关于军统和戴笠的书籍中了解的很多了，本书就不

再赘述。但可能人们并不知道戴笠在蒋政权中掌握那么大的权力，却不是国民党员的内情。

1938年3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时，蒋介石欲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得知此事后，连忙向蒋介石报告：“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中央委员呢？”

蒋听了非常惊奇，忙问：“你既是黄埔学生、复兴社社员，又在我身边干了这么多年，为何还不是党员呢？”

戴笠忙说道：“我以往一心追随校长，不怕衣食有缺、前途无望。入党不入党，不是学生要关注的事。高官厚禄，非我所求。”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立刻写了一张条子。戴笠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几个字，他连忙推辞，坚决表示终生只做蒋的“无名学生”，不当中央委员，“只要校长信任，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了”。

这正是戴笠的高明之处。

1945年，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时，蒋介石又要圈定戴笠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戴又坚辞不受，并再三向蒋表示，“唯校长信任是图，‘党、官’二字是无所谓的”。

蒋介石从此对戴更是垂青备至。

3. 军统“家族”

掌门人戴笠

军统局不同于国民政府任何其他的机构。它既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和其他部门类似的特点和性质，同时也是戴笠的“家天下”。无处不体现着戴笠的特殊价值观。

可能出乎很多读者的意外，戴笠在网罗军统的一线特工时，最初要找的对象不是什么受过特殊间谍训练的，像电影《007》里面的神通广大的特工人员，而是练过武术的侠客。就像《史记》和《七侠五义》里描述的那种放浪不羁、敢作敢为的游侠。他甚至把“功夫大师”请到军统局讲课，给部下灌输侠义思想。这听起来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但戴笠的确就是这样做的。

为了寻找江湖好汉，他派出特务处人员深入穷乡僻壤，在浙江的山区

嵊县和湖北汉水上游的襄阳等地招兵买马。因为他觉得，这些地区以穷山恶水出土匪游民而出名，流传着不少武侠豪杰、绿林好汉仗义行侠的故事，就一定会找到他想要的人选。

戴笠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还非常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关系来扩招特工。在军统还没有开办各种训练班前，尤其讲究这种关系。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差不多都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

他还要求，军统的成员要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的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族”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牺牲，就像蒋介石当年亲自领导的力行社中的“革命战士”那样。



笑里藏刀、老奸巨猾的戴笠

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按照这样的逻辑，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

戴笠要求军统局的成员不能独立思考，必须满足上级的一切要求，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要无条件地服从。

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军统局成员要完全抹杀自我。正是因为这种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也使戴笠通过掌握秘密权力，打开了自我扩张的渠道。

戴笠终身效仿校长，对于内部下属一贯是“严于律己、严以待人”，颇为苛刻。至少在表面上戴笠是个非常自律的人。戴笠飞机失事死后，国民政府派员为他整理遗物，结果惊奇地发现，他所有的财产除了书籍以外，仅仅能够装满一个小皮箱，大多为衣物之类，值钱的东西也有，只是几块瑞士手表而已。

许多史料和文艺作品中，都说戴笠是中将军衔的军统局长。其实，一直到死，戴笠都只是一名少将，而仅仅是“少将加中将军衔”（这是国民党军中的一种特殊授衔体制）。军统局机构中的将军多达数十名，戴笠则始终和

他们佩戴着同样的少将军衔。只是在1946年3月7日戴笠飞机失事摔死后，国民政府才于当年的6月11日发布命令，追赠其为陆军中将。

戴笠对国民党内高层的纷争倾轧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军统局是被相当多的高级将领所厌恶的，因为军统的矛头所向，不仅是共产党和日本人，也指向国民党内部。如果因为自己的颐指气使再加上和他们一样的军衔，自己就更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而难以开展工作。所以他采取了低姿态。他要的只是实际上的、无上的权力，军衔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虚幻的名声罢了。

但在军统局内部，他极为看重的却是培养自己的“亲兵爱将”。为此，他先后开办过几十期的特工培训班。如松江、青浦（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中的主人公就是青浦班毕业的）、临澧等训练班。在这些训练班中受训后的男女特工，后来不仅成了军统局的骨干，更是成了戴笠的忠诚属下。

“小黄埔军校”

湖南的临澧军统特训班是所有培训班中规模最大，也是戴笠最为看重的一个。

1938年1月，戴笠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再去筹备一个训练班，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尽全力协助。

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著名特工还有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人。

培训班的地点选在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知所有外勤各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工介绍自己的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外貌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如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因为这些已经参加了军统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学生中起监督作用。

但以后对学生在年龄上的限制放宽了，其中还有不少30多岁的人。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求华中与西南的几个省选送学生。

戴笠一向认为，军统最缺少的就是干部，因为抗战开始后，工作量比以往增加了十倍、百倍。临澧特训班开学时，学生总数虽有1100多人，戴笠却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

后来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了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于是又想方设法到社会上去拉，比如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

临训班最初的名称叫“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戴笠当时还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所以1938年4月，把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军统局内却一直叫它为“临训班”，毕业的学生被称为中央警校特训班第一期，或简称特一期。

军统局在抗战期间办过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特工培训班，其他培训班的规模都要小得多。临澧特别训练班却设了三个部，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

笔者近日找到了这个培训班人员组成的史料，殊为珍贵。不妨在这里罗列出来以飨读者。

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第一大队下辖三个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这个队的专业为情报队。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这个中队是专学行动的。

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这个队专门学习军事谍报参谋业务，称为谍参队。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这两个中队都是学习打游击战的，又称为军事队。女生直属中队队长为安占江。政治指导员先后由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苹、武奎元等人担任，这几个人后来都成为了军统著名的女特工。

进行专业训练的选择标准是：凡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较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入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识过人的选入行动队；对军事学有点基础的选入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人选入军事队学习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入情报队与行动队。

此外还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部分女生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

戴笠有意把这个特训班办成自己的“小黄埔”，因此狠下了一番工夫，他本人虽不能经常亲自主持特训班的活动，却在班里设了一个主任办公室遥控。

戴笠曾数次到培训班视察。

1938年戴笠第一次去视察时，培训班还颇费了一番苦心安排了欢迎场